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34

2009年6月25日

“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上）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

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 沈志華

中朝關係在中國大陸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相關的檔案文獻也異常難尋。所以，在若干年前論及到這個問題時，除了老生常談的官方宣傳，真正的學術研究在中國幾乎是看不到的。所幸的是，最近十幾年來，隨著中國和俄國有關朝鮮戰爭檔案文獻的不斷解密，特別是有關中蘇參與戰爭情況研究的深入發展，這一時期中朝關係的真相開始有所顯露，於是人們就完全可以掀開鐵幕，逐步地考察現代中朝關係的歷史過程了。¹

¹ 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和中國檔案的英文本，主要發表在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不定期刊物*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俄國檔案的中文本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三

儘管從法律意義上講，中朝同盟是1961年7月正式形成的——那時簽訂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但幾乎沒有人否定，自1950年中國出兵朝鮮開始，雙方的同盟關係實際上就已經確定下來。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從抗美援朝運動開展以來，談到中朝關係，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彙就是“唇齒相依”，以此表明這兩個國家休戚與共，命運相連。² 當年甲午海戰，中國就是為了保護朝鮮，不惜以初建的海軍與日本鐵甲艦拚殺，結果一敗塗地。如今，又是為了挽救朝鮮，中國新政權再次不惜冒著引火燒身的危險，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對陣。仔細品味，中國這兩次為援助朝鮮而出兵作戰，確有“唇寒齒亡”的擔憂。不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革命形勢的出現，特別是冷戰格局的形成，歷史上影響中朝關係的傳統的地緣因素和情感因素，已經漸漸退居次要地位，而不斷凸顯出來的則是革命的和政治的因素。這無疑是觀察現代中朝關係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問題在於，早已形成的中朝同盟關係為什麼要等11年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

本文擬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國和俄國檔案文獻及口述史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以下簡稱《朝鮮戰爭解密文件》）。關於中國發表的有關檔案文獻，除以前人們熟知的外，最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出版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提供許多新的材料。涉及到中朝關係的重要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2; 以及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修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不過，坦率地講，這些研究都只是涉及而沒有專門討論中朝關係問題。

² 經筆者粗略統計，從1950年11月至1952年12月兩年期間，僅《人民日報》刊登的報道和文章，就有66篇以“唇齒相依”一詞來形容中朝之間的緊密關係。

料，詳細考察中國與北朝鮮同盟關係建立和延續的歷史過程，即1946年夏天中朝非正式“同志關係”建立的背景，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的曲折經歷，1956年圍繞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中朝關係的變化，1958年志願軍主動全部撤出朝鮮的緣由，以及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的過程，試圖說明在冷戰背景下這種同盟關係的本質特徵。

一、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

近代以來，中國和朝鮮同時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威脅，共同的命運把它們聯繫起來。日俄戰爭，特別是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以後，大量的朝鮮人移民中國東北，並在那裡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³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分散在中國北方的各種朝鮮抗日力量逐步聯合起來，歸屬到中共和八路軍的領導下。1941年1月，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武亭（Mu Chong）為會長的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1941年6月，成立了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直接受八路軍統轄。1942年7月，在中共的支持下，聯合會改名朝鮮獨立同盟，由金料奉（Kim Tu-bong）、崔昌益（Choe Chang-ik）領導，同時將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擴編為朝鮮義勇軍，總司令為武亭，副司令為朴孝三（Pak Hyo-sam）、朴一禹（Pak Il-u）。戰爭結束前夕，朝鮮獨立同盟主要領導幹部全部集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批年輕幹部如徐輝（So Hwi）、尹公欽（Yun Kong-hum）

³ 朴宣冷：《東北抗日義勇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с.135~160。

等加入同盟的領導班子。⁴ 後來，這批人陸續回到朝鮮，成為朝鮮勞動黨內“延安派”的主體。

朝鮮光復後回國的還有一批幹部，這就是以金日成(Kim Il-sung) 為首的“游擊隊派”。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金日成於 20 世紀 30 年代初來到中國東北，並受中共中央委託在吉林組織抗日游擊活動，擔任過團、師的政委，後來成為東南主要戰線的指揮官。⁵ 在日本關東軍的大規模圍剿下，少數倖免於難的游擊隊員於 1938~1942 年陸續撤退至蘇聯遠東地區，在那裡接受軍事訓練，並補充彈藥和裝備。1942 年 7 月蘇聯遠東方面軍受命在哈巴羅夫斯克市以東地區組建了第 88 獨立步兵旅，旅長是中共黨員周保中。金日成帶領其殘餘部隊於 1942 年加入 88 旅，被分配在基本上由朝鮮人組成的第一營。金日成表現出眾，俄語學得快，多次受到表揚，很快成為這支朝鮮人隊伍的核心人物。日本投降後，9 月中旬金日成和他的戰友金一(Kim Il)、姜健(Kang Gen)、崔庸健(Choe Yong-gon) 等人被蘇聯人送回朝鮮，金日成成為蘇聯佔領軍在平壤代表的助手。⁶ 不久，由於美蘇關係惡化，以三八線為界由美蘇分區佔領的朝鮮半島的政治局勢也緊張起來。1945 年 12 月莫斯科會議以後，蘇聯佔領當局逐漸把以曹晚植(Cho Man-sik) 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者排擠出政治舞臺，而扶持金日成上臺，並聯合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幹部代表許哥而(Ho Ka-yi, “莫斯科派”的代表人物) 以及來自南方的朝鮮共產黨代表朴憲永(Pak

⁴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1921~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269~273、299 頁；劉金質等編：《中朝中韓關係文件資料彙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727、801 頁。

⁵ 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5，д.840，л.16，轉引自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0。

⁶ ЦАМО 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ф.1896，оп.1，д.1，л.1，д.4，л.29，轉引自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0~143。

Hon-yong)、朴正愛(Pak Chong-ae)等(“南方派”的代表人物),建立起親蘇的北朝鮮政權。⁷

在戰後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運動中,出現了一股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在鬥爭實踐中也努力尋求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在1947年冷戰爆發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後,各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便逐步趨向為同一目標和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和北朝鮮走到了一起,為了各自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他們同心協力,互相支援。於是,由於地理原因形成的“唇齒相依”的關係又注入了革命的(即政治的)因素。

1945年8月11日,朱德在延安發佈第六號命令,要求朝鮮義勇軍立即隨同八路軍向東北進兵,消滅日偽力量,同時準備解放朝鮮。⁸ 8月12日、15日和18日,朝鮮獨立同盟總部先後發表了三個文告,號召日軍中的朝鮮士兵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呼籲朝鮮僑民加入朝鮮義勇軍,為建立一個新的朝鮮共和國而鬥爭。⁹ 10月27日,先期趕到東北負責接收工作的陳雲報告,中共長春市委決定派出大批幹部到長春以西地區,任務是“擴大部隊,發動群眾,接收政權”。¹⁰ 與此同時,第一支到達安東的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遭到蘇聯佔領軍的阻攔,以盟國有關三八線的約定為由,不許他們進入朝鮮境內。於是,在11

⁷ 詳見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第1~48頁;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韓國)極東問題研究所1974年,第254~255頁;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徐柱錫譯,(韓國)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年,第112~113頁;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29~44頁。

⁸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23頁。

⁹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第389~390頁。

¹⁰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447~452頁。

月初武亭率領三千餘名義勇軍戰士到達瀋陽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只派少數領導幹部去朝鮮，大部分指戰員留在東北，編為七個支隊（實際組成的是第一、三、五、七支隊），到各朝鮮族居住地發動群眾，擴充軍隊，為中國革命和朝鮮革命積蓄力量。12月13日，武亭、金料奉、崔昌益等僅率70餘人乘坐蘇聯方面提供的火車到達平壤。¹¹這批留下的部隊迅速在朝鮮族中擴充，後來編入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在內戰時期，吉林延邊五個縣朝鮮族參軍者達34855名，此外還有約十餘萬朝鮮族人參加了公安部隊、民兵等地方武裝組織。¹²

由於中國內戰（特別是在東北地區）的複雜局面，以及朝鮮義勇軍的主要幹部已回朝鮮，其編制也已經撤銷，中共高層便與朝鮮方面並沒有建立直接的聯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¹³不過，中朝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中斷，通過中共東北局在朝鮮建立的辦事處，兩國革命者繼續密切往來，互相幫助。

在東北內戰初期，中共面臨鉅大困難，特別是在南滿地區，由於與北滿的聯繫被國民黨切斷，環境十分艱苦，不得不求助於朝鮮。南

¹¹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第394頁；李香淑：〈關於武亭的抗日革命活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11月；金景一：〈關於中國軍隊中朝鮮官兵返回朝鮮的歷史考察〉，《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第56頁。

¹²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檔案館編：《延邊地委專署重要文件彙編》第一集，1986年12月，未刊，轉引自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七輯，第265~288頁；關於朝鮮族部隊的編制及參加作戰的詳細情況，還見中國朝鮮族歷史足跡編輯委員會：《勝利》，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7~83頁。

¹³ 在1946~1948年中共的《解放日報》、《晉察冀日報》和《人民日報》在報道朝鮮情況時，將勞動黨譯為勞工黨，金日成譯為蓋彌生或金貽蓀，金料奉（Kim Tu-bong）譯為金托本和金料鳳，朴憲永譯為柏亨寧。中共高層對朝鮮情況不熟悉，由此可見一斑（劉金質等編：《中朝中韓關係文件資料彙編》，第1217、1249、1403~1575頁）。

滿與朝鮮一水相隔，兩國邊界長達八百公里，水路交通緊密相連。1946年7月，中共東北局在平壤組建駐朝鮮辦事處，朱理治擔任全權代表。通過辦事處，中共東北局幹部與朝鮮領導人恢復了聯繫。朱理治與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鮮領導人來往密切，更經常與朴一禹、武亭、姜健等延安派幹部豪飲憶舊。就連駐朝蘇軍將領，也喜歡到辦事處來飲酒吃菜，聯絡感情。¹⁴

據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給東北局的報告，通過辦事處，朝鮮方面向東北局提供了大量幫助：一、接收傷病員和家屬。通化、安東失守後，中共有1.5萬多傷兵和家屬退到北朝鮮，分散安置在朝鮮居民家中；二、供應物資和武器裝備。到1947年6月，供應（部分是通過交換）東北局的物資共四批約八百至一千個車皮（以軍用物資為主）。其中繳獲後留存朝鮮的日本軍用物資是金日成建議並主動幫助中共向蘇軍索要的；三、接待中共過境人員。九個月來，共安排東北局幹部、一般人員和轉運部隊總計約二萬人；四、幫助保存和轉移物資。中共撤退後暫交朝鮮保存的物資二萬多噸，往來都有朝鮮勞動黨員幫助搬運。東北局通過朝鮮轉運的物資，只收不足1%的稅率，運費也較便宜，有的則免交運費。在緊急運輸時，朝鮮甚至停止了自己的客運。總之，正如金日成在給林彪的信中所說，對於中共的要求，“他總是盡力幫助的”。朱理治總結說，對於中國革命鬥爭來說，北朝鮮起了“大後方”和“橋樑”的作用，實現了東北局“以北朝鮮為變相的、隱蔽的後方來支援南滿作戰”的意圖。¹⁵ 從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中共通過北朝鮮轉運和交換的物資多達52萬餘噸，

¹⁴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468~470頁。

¹⁵ 朱理治給李富春轉東北局的報告（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給東北局的政治報告（1948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39~241、242~244頁）。

過境人員二萬餘人。1948年，僅通過圖門——南陽口岸過境的就有8685人。東北局的很多重要幹部，如陳雲、李富春、朱瑞、劉亞樓、肖華、張愛萍等，都曾數次途經朝鮮，後來不少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黨派和海外華僑的著名代表人物，如李濟深、沈鈞儒、張瀾、馬敘倫、蔡廷鍇等，也是從香港取道朝鮮轉入中國大陸的。¹⁶

當然，援助都是互相的。中共對朝鮮的幫助主要是提供糧食和兵員。1946年夏秋之交，金日成找到從延安返回朝鮮的丁雪松，請她與東北局負責人聯繫，支援朝鮮一些糧食。據朱理治報告，到1947年夏，經劉亞樓送去一萬噸，東北局又送了二千噸，連同物資交換，總計向朝鮮提供糧食三萬噸左右。¹⁷ 中共提供的最大幫助應是以原朝鮮義勇軍和東北民主聯軍中的朝鮮族官兵為主體，協助北朝鮮建立了一支軍隊。1946年8月以後，金光俠（Kim Kwang-hyob）、姜健、崔光（Choe Kwang）等分批帶領在東北境內的部分朝鮮族部隊回國，並接受了蘇聯顧問的指導。1947年2月8日朝鮮人民軍成立大會召開時，這批回國的戰士組成了人民軍第一師團，金雄（Kim Ku）任師團長，姜健任參謀長。這是第一支從中國回到朝鮮的軍隊。此外，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至1949年3月，從東北解放區陸續回到朝鮮的軍事幹部和軍校學員近八百名，這些在中國經歷過戰鬥洗禮的軍官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骨幹力量。¹⁸

¹⁶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第461頁；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中共黨史資料》第十七輯，第197~200、202~204頁。

¹⁷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第239~241頁；丁雪松口述、楊德華整理：〈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錄〉，《天津日報》專副刊2001年3月14日，第11版。

¹⁸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第241頁；金景一：〈關於中國軍隊中朝鮮官兵返回朝鮮的歷史考察〉，《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第58頁；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七輯。

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金日成和毛澤東都認識到相互幫助的重要性。金日成曾說：“協助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朝鮮共產主義者和人民崇高的國際主義任務”，“中國革命的勝利對我們祖國的發展和安全也是有益的”。¹⁹ 毛澤東也堅持認為，東方各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應當團結起來，“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²⁰ 正是在這種政治理念的基礎上，雙方互相援助，金日成為中共提供了庇護所，而中共幫助北朝鮮建立了軍隊。當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成功的時候，人們甚至考慮要成立亞洲共產黨聯盟。²¹ 顯然，此時中朝之間仿照中蘇條約建立一種正式同盟關係的基礎已經成熟，但這一進程卻被朝鮮進一步的革命舉動所中斷。

二、在武力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上的矛盾與合作

1949 年下半年，毛澤東要解放臺灣，金日成要解放朝鮮南方，

¹⁹ 《金日成全集》第八卷，（朝鮮）朝鮮勞動黨出版社 1993 年，第 284~389 頁。

²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第 66、94 頁。

²¹ 1949 年 2 月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時表示，蘇聯支持建立以中共為首的亞洲共產黨局。按照斯大林的意見，最初可以由三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組成，以後逐步吸收其他政黨（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47~53,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с.62~66)。不久，緬甸、馬來亞、印度支那共產黨也給中共中央寫信，建議成立東方各國共產黨情報局。但毛澤東認為中國內戰尚未結束，時機還不成熟（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 188、189 頁）。

雙方在各自尋求政權統一的過程中發生了分歧，同時又都寄希望於莫斯科的支持。朝鮮戰爭的爆發，說明斯大林站在了平壤一邊。過去，在傳統派學者中有一種“共謀論”的說法，認為朝鮮戰爭是蘇聯、中國和朝鮮共同策劃的。²² 後來一些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²³ 近年來解密的檔案文獻表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斯大林和毛澤東最初都反對金日成急於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的主張，後來斯大林改變了主意，為金日成開放綠燈，迫使毛澤東放棄了自己的方針。在這個問題上，中、蘇、朝三國的關係十分微妙，中國對朝鮮的做法雖然不滿，但又不得不表示支持。

中國人第一次知道朝鮮準備通過戰爭實現民族統一的主張是在1949年4月底，當時傳出消息，美軍即將從朝鮮南部撤出，李承晚（Lee Syngman）政權正在積極準備發動對北方的進攻。²⁴ 於是，金日成委託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訪問中國，尋求幫助。金一來到中共中央剛剛進駐的北平，與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舉行了會談。關於朝鮮的局勢，毛澤東擔心的是南朝鮮隨時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他勸金日成要做好周密準備，還答應如果出現日本幫助南朝鮮發動進攻的情況，中國也會派軍隊援助朝鮮。但毛澤東又特別指出：“如果美國人走了，日本人也沒有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勸朝鮮同志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在進攻時，麥克阿瑟（MacArthur）能夠迅速把日本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來。而我們又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給予支援，因為我們的全部主力已到長江

²² 日本學者中島嶺雄曾撰文比較集中地介紹了這種理論（Mineo Nakajima：“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 №1，第19~47頁）。

²³ 見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第130~154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第106~121頁。

²⁴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70、172~173頁。

以南去了。”關於金日成要求中共軍隊中朝鮮族部隊回國的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朝鮮師中，有兩個駐紮在瀋陽和長春，另一個正在作戰。中國隨時準備把駐紮在東北的兩個師連同全部裝備，移交給朝鮮政府。另一個師，只有等中國的軍事行動結束後才能從南方回來。對於金日成提出的成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現在這樣做為時過早，因為中國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鮮局勢又緊張，如果成立情報局，會被認為是成立軍事同盟。²⁵顯然，毛澤東並不贊成金日成在中國完成自己的統一大業之前採取軍事行動，故而婉言拒絕了朝鮮急於成立亞洲情報局的建議，而同意朝鮮族部隊回國以及對朝鮮提供援助，主要是擔心北方會受到南方的攻擊。

毛澤東所說駐紮在瀋陽和長春的兩個朝鮮師，即李德山任師長的164師（駐長春）和方虎山（Bang Ho San）任師長的166師（駐瀋陽），當時均屬東北軍區建制。美軍撤出朝鮮半島後，由於擔心南方發起進攻，1949年7月上旬，金日成決定將這兩個師立即調回朝鮮：長春師改編為人民軍第五師團，配置在羅南，瀋陽師改編為人民軍第六師團，配置在新義州。回國時，164師實員10821人，166師實員10320人，配備了全套輕重武器。根據蘇聯駐朝大使兼軍事總顧問什特科夫（Shtykov）的安排，“他們的任務就是在南朝鮮軍隊進攻時投入到北朝鮮境內展開防禦戰”。²⁶這是第二批回國的朝鮮族部隊。

²⁵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87~188頁；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9~61；還參見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59a, оп.5a, п.11, д.3, л.46~53。

²⁶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1949年10月，未刊，第76~77頁；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205~208、215頁；參見金東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師回朝鮮問題新探〉，《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頁；金景一：〈關於中國軍隊中朝鮮官兵返回朝鮮的歷史考察〉，《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第52~61頁；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七輯。

另一支朝鮮族部隊回國的問題是在毛澤東訪蘇時提出來的。1949年12月25日林彪等報告，目前在人民解放軍各部隊服役的朝鮮人大約還有1.6萬名，成建制的有四個營、27個連、九個排，還有一些分散在各部隊中。解放軍南下後，這些人曾一度出現思想波動，有人要求回國。現在戰爭即將結束，“為了朝鮮人民的利益，我們想把這些經過訓練的幹部送回朝鮮”。如果朝鮮方面同意，“可以把他們集中起來並組成一個正規師或四五個正規團，經過短期訓練後讓他們回國”。29日，總參謀長聶榮臻給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轉發了這封電報，並請求給予指示。²⁷ 毛澤東向蘇聯方面進行通報以後，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電什特科夫，要求他拜訪金日成，瞭解朝鮮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態度。²⁸ 1月9日，什特科夫與金日成會晤。金日成報告，他也接到了中國貿易代表交來中國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說：“由於戰爭行動結束，中國人民軍隊中現有朝鮮族部隊正逐漸閉下來，如朝鮮政府願意，可以轉交給它。”金日成請教如何答復中方，並說：“他希望把這些部隊調回朝鮮，近日內朝鮮將派三名代表赴華就此問題與中國政府談判”。由於朝鮮駐地困難，金日成想請中國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這支部隊留在中國。²⁹

接到朝鮮方面的要求後，1950年1月11日，劉少奇指示東北人民政府駐平壤辦事處副主任文士楨轉告金日成，同意即派三人來中國準備接收朝鮮部隊，也同意朝鮮部隊在中國改編並於4月間更換夏裝後回朝鮮。同時，劉少奇把情況通知了林彪。³⁰ 1月14日，朝鮮人

²⁷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9,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89-90。

²⁸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280頁。

²⁹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281頁。

³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319-320頁。

民軍作戰部長金光俠等到達北京，與聶榮臻洽談此事。³¹ 1月22日，劉少奇又致電毛澤東：金日成已派人來接收林彪部隊的朝鮮籍戰士和幹部(共1.4萬餘人)，並“要求隨帶全部武器”。毛澤東批示：“同意照辦。”28日劉少奇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³² 這支部隊分兩批於1950年3~4月在鄭州集結，隨後返回朝鮮，分別編入朝鮮人民軍第四和第七師團。³³ 臨行前，部隊官兵還分別致電毛澤東、朱德和林彪，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並堅信：“中國革命勝利不僅是東方被壓迫人民最好的榜樣，而是朝鮮革命勝利的堅強的基礎”。³⁴ 這是第三批回國的朝鮮族部隊。

這兩批朝鮮族軍隊和軍事幹部都經歷了大規模戰爭的考驗，他們返回朝鮮，無疑大大增強了人民軍的軍事實力和戰鬥能力。不過，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考察說明，無論是北京還是莫斯科，其目的並非為了發動一次進攻，而只是出於一種革命的道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對朝鮮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1949年夏天，中蘇兩黨商談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工問題。斯大林對秘密來訪的劉少奇說，以後蘇共負責西方的革命，中國則要擔負起領導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責任。³⁵ 具體地講，援助朝鮮就是中共的責任

³¹ 參見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2年，第744頁。

³²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第320頁；俄文檔案見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0。

³³ 朴明林：〈韓國戰爭的爆發和起源〉，（韓國）高麗大學博士論文，1994年8月；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七輯。

³⁴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第四野戰軍政治部編印：《朝鮮是中國親密的鄰邦共患難的戰友》，1950年10月，未刊，第20~24頁。

³⁵ 劉少奇致中共中央電，1949年7月27日（凡未註明出處或館藏號的文件均系沈志華個人收藏的中國檔案，下同）；師哲：《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12頁；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之一。不過，這種援助在當時還是防禦性的，因為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反對使用軍事進攻的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甚至金日成也不急於要這些部隊回國，原因只有一個：此時發動戰爭的問題尚未提上日程。

據俄國檔案文件，1949年6月底美軍撤出朝鮮半島後，金日成便急不可待地要“先下手為強”。9月3日，金日成向蘇聯使館提出了一項主動進攻計劃，即搶先“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奪佔甕津半島及從甕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南朝鮮地區”，希望莫斯科批准採取這一行動。³⁶9月下旬，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朝鮮的請求，並做出決議，拒絕批准金日成的計劃。莫斯科的復電說，對南方發動進攻就意味著戰爭爆發，對此，“北朝鮮無論在軍事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都沒有做好準備”。同時，“如果軍事行動由北方主動發起並變為持久戰爭，那麼就可能給美國人提供以各種方式對朝鮮事務進行干涉的藉口”。³⁷在這個問題上，北京的立場與莫斯科是一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金日成再次提出了朝鮮統一的問題。1949年10月2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朝鮮同志想通過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中國領導人曾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做。³⁸10月26日莫洛托夫（Molotov）為斯大林起草了復電：“我們同意您的意見，目前朝鮮軍隊（還）不應實施進攻。我們也曾經向朝鮮朋友指出，他們擬組織的朝鮮人民軍對南方的進攻還不能付諸實施，因為，目前無論從

Цзэдуно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с.78~79。依前文所述，此時說到的亞洲共產黨情報局或聯盟自然還是包括朝鮮的。不過，到中蘇同盟條約簽訂，斯大林考慮發動朝鮮戰爭時，正如下面將要談到的，斯大林已經把朝鮮半島排除在中共控制的範圍以外了——在失去旅順海軍基地的情況下，蘇聯唯一可以指望的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就在朝鮮半島了（有關這一觀點的論述詳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129~158頁）。

³⁶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230、238~254頁。

³⁷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255~260頁。

³⁸ 1996年7月31日筆者在莫斯科訪問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記錄。

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沒有作好進攻的準備。”³⁹或許是感到在電報裡這樣說過於暴露，11月5日蘇聯第一副外長葛羅米柯（Gromyko）正式發出的電報改為：“我們認為必須向您通報，我們支持針對你們所說的問題的那種意見，同時我們將依照這種精神向朝鮮朋友提出我們的勸告。”⁴⁰顯然，到這時斯大林和毛澤東一樣，還是反對金日成發動戰爭的。

就在毛澤東訪蘇並逼迫斯大林同意簽訂中蘇同盟新條約之後，莫斯科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⁴¹由於在同毛澤東的談判中蘇聯做出了重大讓步，為彌補損失，保持蘇聯在太平洋擁有一個出海口和不凍港，現在斯大林已決心將朝鮮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了。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通知平壤，他同意朝鮮的計劃，並要求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具體商議。但是，斯大林並沒有將這個想法告知當時就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毛澤東走後，4月10~25日，斯大林與金日成在莫斯科詳細討論了在朝鮮半島發動一場戰爭的計劃。或許是考慮到不久前莫斯科還贊同中國反對在朝鮮立即採取軍事行動的立場，亦或是考慮到避免將來出現意外情況時蘇聯陷於被動，斯大林最後告訴金日成，這件事必須要經過毛澤東的認可。⁴²

根據斯大林的要求，1950年5月12日金日成決定秘密訪問北京，

³⁹ 據列多夫斯基解釋，括號中的“還”字為斯大林所加。這說明，斯大林知道毛澤東原則上不反對採取軍事行動，只是對進攻時機有所考慮（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2~93）。

⁴⁰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276頁。

⁴¹ 中蘇條約談判的過程參見沈志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頁；沈志華：〈關於中蘇條約談判研究中的幾個爭議問題——再談冷戰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讀與利用〉，《史學月刊》2004年第8期，第57~68頁。

⁴² 對於這一過程的詳細描述，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129~158頁。

向中國“通報他們以武力統一國家的意圖和在莫斯科會談此問題的結果”。但是，金日成並不情願去見毛澤東，他向斯大林表示，朝鮮不再需要中國的援助，“因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經得到了滿足”。⁴³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飛赴北京，當天便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目前沒有發現關於會談內容的材料。但根據蘇聯大使羅申（Roshchin）向莫斯科的報告看，第一次談判並不順利，會談在當天晚上便中斷了。羅申的電報說：23時30分，周恩來到蘇聯使館，要求立即向斯大林報告：“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Filipov）同志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了；但這個問題必須與中國同志和毛澤東本人討論”。“毛澤東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電報最後說，“中國同志請求速速回電”。⁴⁴

直到這時，斯大林才不得不向中國領導人表明，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1950年5月14日下午毛澤東接到了斯大林的回電：“在與朝鮮同志的會談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提出，鑒於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於實現統一的建議。同時補充一點，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會談詳情可由朝鮮同志向您講述。”⁴⁵ 既然蘇聯和朝鮮已經事先商定，毛澤東只好當即回電表示贊同莫斯科的看法，但同時又謹慎地提出，在這種情況下，他已向朝鮮同志表示，《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應在朝鮮實現

⁴³ 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00~103。

⁴⁴ 羅申致莫斯科電，1950年5月13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383頁）。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⁴⁵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1950年5月14日，АВПРФ，ф.45，оп.1，д.331，л.55。

統一後再簽訂。對此，斯大林自然回電表示同意。⁴⁶ 關於中朝同盟條約的問題是怎樣以及何時提出的，目前尚無史料說明，不過，毛澤東此時提出推遲簽訂條約，很可能反映了他心中的不滿以及對局勢發展並不樂觀的估計。

在 1950 年 5 月 15 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在中國攻佔了臺灣以後朝鮮再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會談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面向蘇聯大使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⁴⁷ 在躊躇滿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上述情況表明，此時中國和朝鮮之間已經存在隔閡和芥蒂。金日成有理由對毛澤東感到不滿，因為朝鮮人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而毛澤東在取得勝利後並沒有立即滿足朝鮮要求統一和解放的意願。其實，毛澤東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朝鮮用武力解決民族統一問題，因為金日成這樣做正是在步中國革命之後塵。不過，按照毛的設想，朝鮮問題應該在中國完成統一大業（解放臺灣，可能還有西藏）後再予以解決。性急的金日成只好求助於莫斯科，而這一點，恰恰又使毛澤東感到不滿。

⁴⁶ РГАСПИ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ф.558，оп.11，д.334，л.56、57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4~95。

⁴⁷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 -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с.30~31；另參見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第 145 頁。

正是因為對中國的不滿意和不信任，金日成回國後就再沒有向毛澤東透露有關戰爭準備和發動的任何消息。⁴⁸ 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名武官來通報戰況。毛澤東很生氣，對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也不和我們商量，現在才來打招呼。”⁴⁹ 不過，這種情緒並沒有妨礙毛澤東出兵援助朝鮮的決心和主張。

三、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心和金日成的反復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十幾年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逐步形成了大體一致的看法。⁵⁰ 最近公開的檔案文獻又補充了許多細節，特別是有關在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毛澤東、斯大林和金日成對中國出兵朝鮮持有不同態度的情況。

儘管對莫斯科和平壤的做法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與戰爭的情況下，毛澤東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1950年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二百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還廣泛動員朝鮮籍醫護人員、司機、工程師等回國服務。自6月下旬至9月初，僅通過東北外事局辦理回國手續的朝鮮幹部、軍人和技術人員就有347名。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經長春鐵

⁴⁸ 一位前北朝鮮高級軍需官回憶說，在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朝鮮的，這樣做的特別目的是不讓中國獲知朝鮮的準備工作（見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第153、163頁）。

⁴⁹ 見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5頁。

⁵⁰ 對這一問題進行比較全面研究的論著有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⁵¹ 中國領導人還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佔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周恩來一方面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三個軍 12 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⁵² 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談到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⁵³

儘管當時人民軍的進攻十分順利，但在美國已決定參戰的情況下，也必須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於是，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周恩來的建議：“我們認為立即集中九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

⁵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第 54 頁；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38；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8-00080-03，第 67~68 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 31~32、60 頁。

⁵²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35~37。實際上，建立東北邊防軍的正式決定是 1950 年 7 月 13 日做出的，於 8 月上旬完成集結的部隊共四個軍及三個炮兵師，總計 25.5 萬人（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108~109 頁），而周恩來提前十幾天就將這個打算告訴蘇聯人，說明了中國領導人急切和焦慮的心情。

⁵³ 羅申與鄒大鵬談話備忘錄，1950 年 7 月 4 日，轉引自 O.A. Westad：“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Wars,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1950~1961”，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⁵⁴ 斯大林還催促中國儘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繫和解決問題。⁵⁵ 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面的聯繫，周恩來早在 6 月 30 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後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盡力去做。”⁵⁶ 7 月 12 日，周恩來告訴金日成，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對朝鮮的干涉，中國政府準備在這場戰爭中盡可能地向朝鮮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幫助。同時，希望向中國“提供比例尺分別為 1 比 10 萬、1 比 20 萬、1 比 50 萬的朝鮮地圖各五百張，並通報朝鮮前線戰況”，還要求“儘快送來朝鮮人民軍軍服的樣品”。金日成及時向蘇聯大使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提出，“既然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一邊參加了戰爭，那麼，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但什特科夫有意迴避了這個問題。⁵⁷

1950 年 7 月 19 日金日成又向蘇聯使館報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與毛澤東會談的情況：毛澤東認為美國將長期參戰，並會在朝鮮投入更多的兵力。他建議金日成“命令部隊停止向敵人進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並答應向朝鮮提供一批武器和軍用物資。毛澤東還說，如果朝鮮需要援助，中國可以派自己的軍隊去朝鮮。中國方面已為此準備了四個軍，共 32 萬人，並希望金日成於 8 月 10 日以前通報自己的意見。當金日成詢問莫斯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時，什特科夫答復：一

⁵⁴ 斯大林致羅申電，1950 年 7 月 5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9。

⁵⁵ 斯大林致羅申電，1950 年 7 月 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82。

⁵⁶ 柴成文是戰爭期間中方保持與金日成直接聯絡的聯繫人（《周恩來年譜》上卷，第 51 頁）。

⁵⁷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 年 7 月 15 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無所知。金日成又說，他原以為毛澤東可能已同斯大林協商過此事，沒有想到這只是毛澤東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對此毫不知情。蘇聯大使在電報中要求莫斯科儘快提出對中國出兵問題的看法，以便日後答復金日成。⁵⁸ 斯大林對此一直沒有回答。他說過，中國出兵的條件是“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如果靠蘇聯的援助金日成就可以取勝，何必要中國插手？如果此時中國出兵，蘇聯還如何控制朝鮮以實現其發動戰爭的目標？看起來，不到危急時刻，莫斯科並不想讓中國軍隊介入戰爭。經過幾次試探後，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這種考慮。

受到莫斯科立場的影響，朝鮮領導人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到達平壤後，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告訴他：“今後有什麼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即使那些過去曾並肩戰鬥過的“延安派”幹部，由於受到嚴格約束，也從不對他談及戰場的詳細情況。⁵⁹ 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瞭解

⁵⁸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⁵⁹ 筆者2000年9月12日採訪柴成文記錄（以下簡稱採訪柴記錄）；當時中國駐朝鮮副武官王大綱的回憶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他們瞭解情況只能通過華僑或來自中國的朝鮮族幹部（見Tsui David：“Did the DPRK and the PRC Sign a Mutual Security Pact?”，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

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⁶⁰

然而，朝鮮戰事 1950 年 8 月在洛東江陷入僵局，這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的準備。8 月 11 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 13 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⁶¹ 8 月 19 和 28 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Iudin）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⁶² 同時，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面，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儘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在 8 月和 9 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Lee Sang-jo）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只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 — 漢城和南浦 — 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

⁶⁰ 赴朝參謀團未能及時派出的原因，周恩來在 1950 年 8 月 26 日的軍事會議上說，是出於中國方面自己的考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45~46 頁），但後來他對蘇聯大使說，是朝鮮方面不同意（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52~54）。有當事人證實了後一種說法（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第 163 頁）。

⁶¹ 高崗在瀋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50 年 8 月 13 日，轉引自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91~92 頁。

⁶²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45、47。

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⁶³ 9月初，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東北邊防軍的兵力計劃增加到70萬人，另有補充兵員20萬人，同時加強了武器裝備。⁶⁴ 中國這樣做無疑是為了防備美國可能採取的行動。

金日成當然明白中國人的意思，但他必須先徵求莫斯科的意見。1950年8月26日，金日成通過電話向蘇聯大使通報，根據他所掌握的情報，美國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區實施登陸。朝方擬採取必要措施來加強上述地區的防務。當晚，金日成借其秘書文日（Mun Il）之口對什特科夫說：“仍然想提出請中國同志派軍隊援助朝鮮的想法，因為人民軍目前的前線狀況太困難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對此的意見，並提到他幾次想給斯大林寫信。金日成還表示，要把這一問題提交勞動黨政治局討論。看到什特科夫無意談論這個話題，文日連忙改口說，上述問題都是他自作主張說的，金日成並沒有請他談這些問題。什特科夫報告說，最近一個時期，金日成越來越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沒有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征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來幫助朝鮮。但這次通過文日刺探口風後，金日成再未提起過這一問題。⁶⁵

在斯大林的盤算中，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讓中國軍隊捲入朝鮮事務的，以免失去對朝鮮的控制，或使東亞局勢更加複雜化。因此，在金日成的反復追問下，斯大林明確拒絕了金日成關於提供國際援助的要求。在1950年8月28日的電報中，斯大林首先告訴金日成，“聯

⁶³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48~49；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第273頁。李相朝的回憶證實了這一情況（櫻井良子（Sakurai Yoshiko）：〈初次披露朝鮮戰爭真相——前高級幹部（李相朝）戳穿虛構的“金日成神話”〉，日本《文藝春秋》（*Bungeishunju*）1990年4月第68卷第5期，第171~172頁）。

⁶⁴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247~251頁。

⁶⁵ 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8月29日，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7, л.666~669。

共（布）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被趕出朝鮮”。接著，又安慰說：“不要因為在與外國干涉者的鬥爭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勝利有時也會伴隨著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斯大林最後答應金日成，“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⁶⁶ 直接聽到斯大林的意見後，金日成“感到非常高興，多次表示感謝”，並一再強調這封信非常重要，應該向政治局委員傳達。顯然是為了解脫自己，金日成解釋說：“有些政治局委員情緒不對頭，瞭解這封信的內容對他們有好處”。⁶⁷ 此後，完全領會了斯大林意圖的金日成便不再考慮請中國提供援助的問題，而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莫斯科了。

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和保證，朝鮮領導人似乎又增強了信心。既然無法得到中國軍隊的支援，自己又無力撤軍回防，金日成決心儘快結束南方的戰鬥。在 1950 年 9 月 4 日柴成文當面向金日成提到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後者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後，就會打破僵局；當柴問到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與此同時，金日成的冒險主義傾向更加明顯。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8.15 前解決問題、8 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9 月 10 日，柴成文回國彙報後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

⁶⁶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1950 年 8 月 2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⁶⁷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 年 8 月 30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⁶⁸

1950年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朝鮮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召見羅申和蘇聯軍事顧問時不滿地指出，朝鮮很少在軍事問題上向中國提供情報，中國曾嘗試派一些軍事技術幹部去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復。根據官方公佈的消息，周建議，如果朝鮮缺少足夠的預備隊（十萬人），就應該將主力北撤。周恩來還不無用意地指出，由於沒有做長時間、大規模戰爭的準備，現在西方國家非常擔心蘇聯和中國可能參與朝鮮的軍事衝突。“應當利用這種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從這方面講，中國軍隊由南方向東北調動，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最後，周恩來請求把這些意見儘快通知蘇聯政府並給予答復。⁶⁹20日莫斯科答復，朝鮮沒有及時提供軍事情報是不對的，原因在於他們年輕，沒有經驗。至於中國的建議，蘇聯同意立即將人民軍主力北撤，建立起漢城防線。但是，對於周恩來提出的中國出兵的問題，斯大林沒有任何回應。⁷⁰周恩來只好建議金日成集中兵力確保三八線，堅持自力更生和長期作戰的方針。⁷¹9月21日，劉少奇再次向羅申表示，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在朝鮮佔了上風，“中國有義務幫助朝鮮同志”。⁷²

在向莫斯科提出中國出兵問題同時，周恩來也詢問了朝鮮的意

⁶⁸ 採訪柴記錄。李相朝的回憶也證實金日成拒絕撤退（櫻井良子：〈初次披露朝鮮戰爭真相〉，日本《文藝春秋》1990年4月第68卷第5期，第171~172頁）。

⁶⁹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23~126, 轉引自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6~108。

⁷⁰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542~545頁。

⁷¹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311~312頁。

⁷²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3~135,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9~111。

見。1950年9月19日，周恩來召見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Yi Chu-yon)，向他講述了前一天與羅申談話的同樣內容，並進一步問，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後，“朝鮮政府下一步對中國政府有什麼要求”。⁷³第二天，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彙報了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並解釋說，中朝之間有過一個約定，即如果敵人在後方登陸，中國人將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接著金日成問什特科夫，應如何答復中國人。在蘇聯大使一句“無可奉告”的外交辭令後，金日成立即說，中國軍隊很優秀，有作戰經驗，但在大量美國飛機不間斷地狂轟亂炸的環境下，他們將會有何表現也很難說。在場的朝鮮人都隨聲附和說：“如果讓中國軍隊到朝鮮參戰，而沒有空軍為其提供空中掩護，那麼，戰鬥依然會相當艱難”。只有外務相朴憲永明確表示希望中國參戰。因為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對這一問題避而未答”。⁷⁴

1950年9月21日，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如何答復周恩來的提議。朴憲永、金科奉和朴一禹都認為，朝鮮明顯無法憑藉自身的力量打敗美國人，因而必須請求中國政府派軍隊進入朝鮮。但金日成發言說：“我們所要求的武器，蘇聯都給我們了，我們憑什麼去向中國人求助呢？”他相信，“蘇聯和中國是不會允許美國人完全佔領朝鮮的”。最後，金日成建議“暫且不要通過關於請求中國政府提供援助的決議，而是先給斯大林同志寫封信，就是否請求中國軍隊援助的問題咨詢一下他的意見”。金日成強調：“如果不請示蘇聯就擅自請求中國軍隊幫助，蘇聯就可能抱怨說，難道我們用顧問和武器來援助朝鮮還不夠嗎？”還說，如果朝鮮加速組建一支新部隊，就不

⁷³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1,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9。

⁷⁴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5, л.86~88。

必求助中國人了。會議沒有通過任何決議。⁷⁵

1950年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漢城可能已經陷落，人民軍主力部隊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斷，並失去了聯繫。金日成擔心敵軍會越過三八線，而朝鮮已無法組建新的部隊進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斯大林的信，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同時也起草了給毛澤東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們現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同日夜晚，金日成來了求援信，懇求斯大林給予“直接軍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國際志願部隊”。⁷⁶ 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莫斯科終於為中國軍隊開放了綠燈。10月1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方式入朝參戰，在三八線以北地區組織防禦。斯大林還故作神秘地說：“我沒有向朝鮮同志談過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談。但我並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後將會很高興。”⁷⁷

從1950年10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到10月19日中國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儘管中間經歷了幾次反復，但毛澤東力排眾議，在蘇聯明確表示暫不出動空軍援助的情況下，毅然決定中國單獨出兵朝鮮作戰，承擔起一個沒有條約約束的同盟者的責任。⁷⁸ 在中國出兵的問題上，平壤完全是看莫斯科的臉色行事。在兩個社會主義大哥面前，金日成是否因“延安派”的存在而對中國軍隊入朝感到擔憂，目前尚

⁷⁵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⁷⁶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金日成致斯大林函，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6~49、41~45。

⁷⁷ 斯大林致羅申電，1950年10月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⁷⁸ 關於中國出兵的決策過程和毛澤東的內心思考，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161~208、278~300頁；最新研究見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第51~65頁。

無證據，但顯而易見的是他更倚重蘇聯。而在斯大林看來，在美國出兵，特別是三八線受到威脅以後，保衛朝鮮和社會主義東方戰線的責任，無疑還是要落在中國身上。因此，在以後中朝關於戰略和策略的一系列爭論中，莫斯科基本支持了中國的主張。

四、在軍隊指揮權問題上的分歧和爭執

中國軍隊進入朝鮮境內，與人民軍並肩作戰，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軍隊的指揮權問題，這也是一個軍事同盟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此，中朝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

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後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朴一禹到瀋陽商議志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朴趕到瀋陽，但並未談及志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只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志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採購，按市價提供。朴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已轉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裡。這說明朝鮮人實際上已經考慮到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來指揮中國軍隊。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雙方指揮

所合在一起。⁷⁹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 1950 年 10 月 1 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志願軍“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⁸⁰ 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彭德懷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他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徵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 歲男子全部徵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 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三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制度”等等。後來彭德懷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⁸¹ 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瞭解朝鮮方面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組建的兵團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與軍事行動，⁸² 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 10 月 21 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面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只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Pak Il-u）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⁸³

⁷⁹ 毛澤東致金日成電，1950 年 10 月 8 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 年 10 月 10 日；採訪柴記錄。

⁸⁰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電報只是發給北京的，平壤對此並不知情（斯大林致羅申電，1950 年 10 月 1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⁸¹ 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 年 10 月 25 日；採訪柴記錄。

⁸² 至 1950 年 10 月 30 日，按照協議，朝鮮人民軍已有九個步兵師及特殊兵種共 11.7 萬餘人撤到中國東北境內進行整編和訓練（見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81~83）；另據負責此項工作的李相朝回憶，戰爭期間在中國境內受訓的部隊總計有 35~36 萬人（櫻井良子：〈初次披露朝鮮戰爭真相〉，日本《文藝春秋》1990 年 4 月第 68 卷第 5 期，第 173 頁）。

⁸³ 採訪柴記錄；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445 頁。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願軍行軍作戰受阻”。⁸⁴ 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志願軍的事件。如1950年11月4日志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面，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⁸⁵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託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志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朴一禹面見金日成，反映幾個有關問題。但商談三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闢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面的主張，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採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懷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志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⁸⁶ 在此期間，彭德懷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六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志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後第七師五千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復。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里設伏的

⁸⁴ 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25日、11月2日。

⁸⁵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167頁。

⁸⁶ 參見採訪柴記錄；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167頁；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年11月11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49頁。

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志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⁸⁷

金日成出於主權和尊嚴的考慮，不願交出對朝鮮軍隊的指揮權，這一點很好理解。但在剛剛遭斷送了幾十萬朝鮮軍隊後，他又要指揮幾十萬中國軍隊，這似乎就不好理解了。從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斷，金日成有此幻想，一則是不瞭解莫斯科的立場，二則是誤解了中國人的某些說法。為了避免刺激美國，中國政府對於進入朝鮮的中國軍隊特別強調其非官方的性質，所以在公開談到部隊指揮權的問題時特別謹慎。1950年10月25日中國軍隊與聯合國軍開戰的消息傳出以後，金日成希望中國同意公佈志願軍參戰的事實，以鼓舞士氣。毛澤東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說中可以提到“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在朝鮮人民軍統一指揮之下配合人民軍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說。周恩來在答復中特別強調，不是“中國志願軍”，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11月12日，周在電報中再次強調，金日成演講的措辭一定要改為：“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在朝鮮人民軍總部指揮之下的參加作戰”。⁸⁸ 然而，這都是一些掩人耳目的說法。實際上，中國並沒有考慮過把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相反，毛澤東還特別建議要金日成儘快與彭德懷和高崗直接見面，商談中朝兩軍聯合作戰的事宜。⁸⁹ 會談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

1950年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志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瀋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

⁸⁷ 彭德懷致軍委轉金日成電，1950年11月9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年11月18日。

⁸⁸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473、491頁。

⁸⁹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475-476頁。

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志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但金日成在發言中只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只好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召開會議再行討論。⁹⁰

事關重大，毛澤東不得不請求莫斯科表態，他在 1950 年 11 月 13 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為妥。”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裡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地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混合編制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制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⁹¹ 17 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Zhakharov）也贊成統

⁹⁰ 採訪柴記錄；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 167 頁；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 年 11 月 18 日。

⁹¹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 167~168 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818~197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162~163 頁。

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⁹²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950年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為正職，朝鮮同志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面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朴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對志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需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志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⁹³金日成返回朝鮮後，12月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干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三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志願軍第九兵團宋時輪指揮。⁹⁴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復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九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

⁹² 馬特維·瓦西里耶維奇·扎哈羅夫(1898~1972)，時任蘇聯軍事部副總參謀長。1950年9~10月曾作為斯大林的軍事代表被派往朝鮮。中國志願軍出兵朝鮮後，又作為斯大林的私人軍事代表被派到北京，因其官職高於原駐華軍事首席顧問科托夫，在中國被稱為駐華軍事總顧問（《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100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164頁）。

⁹³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168~169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122~123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611~612頁。

⁹⁴ 採訪柴記錄；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50年12月6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年12月7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53頁。

度去瞭解第三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⁹⁵ 不過，毛澤東還是有些擔心。他指示不要再搞聯合指揮部職權條例草案了，這“不僅在兩國關係上，更主要在國際關係上”都不利。還強調說，中朝聯軍指揮部只能在實際上組織起來，對外不宜公開，對內也只下達到軍部及獨立師師部。不過，有關戰爭各事實際上必須統一指揮。⁹⁶

截至 1951 年 4 月 15 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七個作戰軍團。其中四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三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⁹⁷ 除了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在中國軍隊出動並取得初戰勝利後，斯大林決定投入蘇聯空軍參戰。⁹⁸ 1950 年 10 月 29 日，蘇聯顧問通知周恩來，莫斯科已同意蘇聯空軍“在安東擔任防空”，並可飛越中朝邊境，還答應十天後將空軍基地從瀋陽移至安東。⁹⁹ 11 月 1 日，蘇聯空軍第一次在鴨綠江上空投入了戰鬥。¹⁰⁰ 1951 年 1 月初，扎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 月初中方空軍將有五個師、朝方

⁹⁵ 彭德懷致第九團電，1950 年 12 月 13 日、16 日、19 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 465 頁。

⁹⁶ 毛澤東致志願軍總部電，1950 年 12 月 8 日。

⁹⁷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 748 頁；1952 年 7 月 6 日，金日成致信志願軍總部，告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調金雄為民族保衛省副相，聯司副司令員由崔庸健接任，金光俠出任人民軍前線司令部司令員；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第 269 頁。

⁹⁸ 筆者關於蘇聯空軍參戰的最新研究，見沈志華：〈對朝戰初期蘇聯出動空軍問題的再考察〉，《社會科學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31~43 頁。

⁹⁹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 427 頁。

¹⁰⁰ 扎哈羅夫致斯大林電，1950 年 11 月 2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空軍將有三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贊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後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但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語言不通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¹⁰¹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麼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問題，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志願軍手裡乃勢在必行。這是金日成在與中國結盟時必須面對的事實。

五、在是否繼續南進問題上的激烈爭吵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後，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志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面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

¹⁰¹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178~179頁；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268~277頁。

軍應採取穩進方針”。¹⁰² 周恩來也持同樣意見，提出除非可以在漢城地區尋機殲滅敵軍，否則，不論敵固守漢城或放棄漢城，我軍均要休整一個時期。¹⁰³ 但出於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¹⁰⁴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後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¹⁰⁵ 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作戰部隊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後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三千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¹⁰⁶ 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¹⁰⁷ 鑒於志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¹⁰⁸ 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障地，並誘我攻堅”，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

¹⁰² 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年12月19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56頁。

¹⁰³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第625~626頁。

¹⁰⁴ 參見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8~39頁。

¹⁰⁵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45~246、249~250頁。

¹⁰⁶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編：《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83頁；彭德懷致金日成電，1951年1月3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64頁。

¹⁰⁷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1年1月4日，АПРФ，ф.3，оп.1，д.336，л.81~82。

¹⁰⁸ 志願軍黨委報告：此時部隊“兵員不足，給養很差，體力削弱，非休整補充、改善運輸供給，難以繼續作戰”（志願軍黨委致中共中央電，1951年1月8日）；參見楊鳳安、王天成：《駕馭朝鮮戰爭的人》，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222頁。

全軍休整。¹⁰⁹ 此舉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後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只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和朴憲永推到前臺。就在彭德懷下令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後，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¹¹⁰ 1951年1月9日上午，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後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¹¹¹ 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¹¹²

1951年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後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儘量縮短，可先出動三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

¹⁰⁹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內部打印本），未刊，第350頁。

¹¹⁰ 採訪柴記錄；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1日；柴成文致彭德懷電，1951年1月8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65~466頁。

¹¹¹ 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軍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頁。

¹¹²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65頁。

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佔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後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朴憲永星夜趕來。¹¹³

1951年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志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志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當日黃昏，彭、金、朴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朴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朴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藉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對他們是很好的藉口。朴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只有再消滅美軍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志願軍只有休整後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志願軍應有三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的。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

¹¹³ 採訪柴記錄；彭德懷與金日成會談記錄，1951年1月10~11日。

定會退出朝鮮，也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只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託於僥倖，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志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如果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志願軍負責。人民軍四個軍團約 12 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然如你們想像的那樣退出朝鮮，我自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復，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志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¹¹⁴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後，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¹¹⁵ 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 1951 年 1 月 14 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 2~3 個月內，中國志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鉅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

¹¹⁴ 採訪柴記錄；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 466 頁。

¹¹⁵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 461 頁；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90 年，第 111~112 頁；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第 11 頁。

部隊的武器裝備；恢復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只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志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¹¹⁶於是，在1月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¹¹⁷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儘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¹¹⁸直到戰爭結束後很久，在朝鮮黨內都流傳著一種說法：中國的志願軍似乎不願意在1951年初武裝干涉者遭到失敗時徹底解放朝鮮。¹¹⁹可見此事對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了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不過，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只是在軍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

¹¹⁶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1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

¹¹⁷ 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п.337，л.37~40。

¹¹⁸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電，1951年9月10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022~1026頁。

¹¹⁹ 費德林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5年4月，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5，оп.28，д.314，л.48。

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儘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¹²⁰

六、關於鐵路管理權的衝突及其解決

隨著志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朝鮮的經濟建設因戰爭而受阻，到1950年底，“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復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復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¹²¹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和衝突隨之爆發。

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志願軍出國作戰部隊的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志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¹²²於是，鐵路運輸

¹²⁰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278~300頁。

¹²¹ 拉祖瓦耶夫給蘇聯副外長佐林（Zorin）的調查報告，1951年5月1日（見沈志華搜集和整理：《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第9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2004年，未刊，第1178~1195頁）。

¹²² 1951年志願軍運輸汽車損失率高達84.6%（《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專業勤務》下冊，金盾出版社1987年，第140頁）。

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早在 1950 年 10 月底 11 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 月 6 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志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¹²³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 1950 年 11 月 16 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¹²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 12 月 3 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後，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¹²⁵ 到 12 月底，中國方面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余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後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¹²⁶ 1951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東北軍區在瀋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志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周恩來率聶榮臻等一批軍方領導人專程來瀋陽參加會議。在會上，周恩來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¹²⁷ 經過努力，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 384 公里）恢復了通車，1951 年 1 月即接運 2944 列車，較上月增加 44%。到 4 月，在軍管局管轄

¹²³ 張明遠：〈風雪戰勤——憶抗美援朝戰爭的後勤保障〉，《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第 34 頁；《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專業勤務》下冊，第 6 頁。

¹²⁴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 449 頁；張明遠：《風雪戰勤》，第 29 頁。

¹²⁵ 採訪柴記錄。

¹²⁶ 《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專業勤務》下冊，第 6 頁。

¹²⁷ 《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基本經驗》，金盾出版社 1987 年，第 41~42 頁；張明遠：《風雪戰勤》，第 34 頁。

範圍內的 1391 公里線路中，通車線路已達到 1321 公里。¹²⁸

儘管鐵路線大體恢復了通車，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由於中朝各自管理自己境內的鐵路，難以協調，在安全保衛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如朝鮮鐵路使用明碼通訊，加上敵特活動猖獗，運輸信息時常洩露，使鐵路運輸和倉儲遭到極大破壞。當時後方供應的物資只有 60~70% 可以運達前線，其餘均在途中被毀。¹²⁹ 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瞭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佔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 1950 年 12 月底積壓載貨列車竟達 329 輛）。¹³⁰ 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採取軍事管制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制，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¹³¹ 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制，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 12 月金日成訪

¹²⁸ 《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資料選編（鐵路運輸類）》下冊，解放軍出版社 1988 年，第 273、282、285 頁。

¹²⁹ 張明遠：《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 年，第 370 頁。

¹³⁰ 《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資料選編（鐵路運輸類）》下冊，第 283~284 頁；張明遠：《風雪戰勤》，第 33 頁。

¹³¹ 《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專業勤務》下冊，第 6、3~4 頁。

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後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制問題，中國同志多次與我們的同志商談，我們總有一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麼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志，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¹³² 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北後勤司令部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幹部）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復的考慮較多。按照朴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面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與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制。朴憲永提出恢復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¹³³

到1951年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面的意見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便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制，還恢復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制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為了儘快達成

¹³² 採訪柴記錄。

¹³³ 葉、張、彭至高崗電，1951年2月19日。

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朴義琬（Pak Ui-wan）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系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劃，其作用只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託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復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認為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面解決，只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¹³⁴

隨後，針對朝方提出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鮮交通省；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任正職，朝方任副職；成立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同樣是中正朝副，高崗提出了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制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制，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在瀋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

¹³⁴ 葉、張、彭致高崗電，1951年3月15日；彭德懷致高崗並周恩來電，1951年3月22日。

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准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後，呈報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況後，周恩來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¹³⁵ 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面。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面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¹³⁶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表示了蘇聯的立場：“我駐瀋陽領事列多夫斯基 (Ledovskii) 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志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

¹³⁵ 周恩來致高崗、彭德懷電，1951年3月25日。

¹³⁶ 張明遠：〈風雪戰勤〉，《當代中國史研究》，第34頁。

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志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¹³⁷ 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復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請朝交通相到瀋陽再談。¹³⁸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1951年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制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¹³⁹ 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中朝各出一人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五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8月1日，在瀋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朝各有一人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

¹³⁷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724~725頁。

¹³⁸ 周恩來致高崗、彭德懷電，1951年3月25日。

¹³⁹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204頁。

為四個師又三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 5.2 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¹⁴⁰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 1959 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¹⁴¹ 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¹⁴⁰ 《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專業勤務》下冊，第 6~7 頁；《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基本經驗》，第 66~67 頁。

¹⁴¹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第 352 頁。